

# 知識天地

## 日本語、漢詩文、儒教與日本帝國的殖民文化統合 —由「同文同種」到「漢賊倒置」—

陳培豐（台灣史研究所助研究員）

此一研究基本上是我對於亞太文化史的初步構思。日本殖民地政策學者矢內原忠雄曾指出，殖民地統治是宗主國政治、傳統和文化的投影。通常以該國的社會形態、政治思想和文化特徵為基礎而架構成形。因此殖民地統治不但具有普遍性和類似性，與此同時也有個別性和特殊性。日本帝國在臺灣的殖民文化政策思想研究，應該是我們理解亞太文化史的重要途徑

西元 1895 年（明治 28 年，清光緒 21 年）甲午戰爭結束後，臺灣被割讓給日本成為其殖民地。殖民地統治雖然起源於歐洲，不過由於日本是亞洲唯一的殖民地宗主國，其殖民地統治方針形成的經過、結構的原理和特色，皆異於歐美各國。例如臺灣統治是不是白種人支配有色人種，也不是基督教文明國家對異教徒的統治。又如被殖民的臺灣與殖民者的日本之間在文化上有明顯的親近性，其共有的文化資產如漢詩文、漢字以及儒學都淵源於中國。由於前述特異性，雖然同為殖民統治，但日本在支配臺灣時，出現了許多不同於歐洲殖民統治的現象。

以日本語「同化」政策為例，日本在臺灣進行文化統合時經常會出現許多矛盾。例如第一任臺灣的文官總督，也就是以提倡過「內地延長主義」政策而聞名的田健治郎，曾經在其任內極力推行過日本語「同化」政策，強迫臺灣人必須學習日本語以便成為日本人。不過令人玩味的是，鼓吹同化政策的田健治郎總督，其本身的日記卻是全部以漢文來書寫記錄。田健治郎的「文官統治」凸顯出以往隱蔽在「武官支配」底下臺灣統治的矛盾；那便是「同文同種」的政治思維或概念。

日本帝國在臺灣進行文化統合時，經常會強調「同文同種」這個政治思維。不過既然臺、日兩者「既是同文又屬同種」，那麼在語言和種族上，兩個具有高度同質性，互為「我者」之「同化」必要性到底在那裡？統治者又如何針對這個以「我者」來同化「我者」的政策作出說明？而這個充滿詭異的「同化」，對日本帝國以及臺灣又造成了什麼樣的影響？上述針對「同文同種」的質疑，還牽涉到一個問題，那便是臺日共同擁有漢字漢文這個文化資產時，那麼對於日本而言，其文學之「內」、「外」的界線又到底要劃在那裡？在「同化」政策口號下日本被迫必須去面對漢詩文的問題：這個源自中國，卻又是日本與臺灣共有的文化資產，到底是要算日本文學還是臺灣文學？漢詩文在皇民化時期其是不是培養或理解日本國民性或日本精神的手段，乃至能否成為所謂的皇民文學？

個人認為日本帝國的文化統合，其實就是日本人再度確認自己作為他者的一個過程。筆者比較關心的是在這個過程中，兩種漢詩文的互動關係以及其所造成的影響。事實上，由於在文化上有濃密的親緣、重層關係，所以日治時期語言和傳統文化思想，一直都不是判斷或分析臺灣人認同傾向的有效途徑。在日本統治下，臺灣有許多類似《臺灣青年》雜誌或作家楊逵以日文來抵抗殖民統治；更有為數頗多的文士或像《風月報》等雜誌，以漢詩文歌頌「同化」或書寫「皇民文學」。更具體地說，日本語在抵殖民的過程中經常是臺灣人的手段武器；相反的臺灣傳統知識分子吟唱漢詩或以漢文作為書寫工具之目的，有時是為了呼應日本政府，而這些人經常具有濃厚的協力者色彩。在日本統治下，臺灣的抵殖民並不明顯具有傳統中國史觀所說的「漢賊不兩立」之歷史情境；反而具有「漢賊倒置」的強烈傾向。而造成這種「漢賊倒置」歷史情境的要素，不僅只是日本語以及漢詩文，還有儒教。

在歷史上日本雖常被視為東亞的儒教國家，然而日本對於儒教的接受與發展皆呈示著一個趨向：那便是由全盤吸收，慢慢走向具有主體性的改造加工式攝取；到了明治維新前後更繼而將儒教當成支持國體論和天皇制國家的一種媒介。換言之，儒教對於日本的文化政治，開始由具本質性意義的存在，逐漸變成戰略性的政治工具。在家族國家原理的下，戰前日本社會中忠孝的概念是不可分割的：天皇所代表的便是國家，忠君便等於是愛國。而

「萬世一系」政權永續性的政治思想與儒教中的禪讓政治理想或易姓革命思想都有衝突矛盾。換言之，天皇制思想在利用、改造儒教之際，其本身也形成了許多包括排斥儒教思想在內的一些特性。而這些特性包括了社會主義、基督教等當然也包含了異民族的殖民地統治。

在經過近代天皇制的形構過程後，日本的儒教發展的變化致使日本在成為帝國，統治臺灣時的一個既重要又紛雜的資產以及負擔。其理由是江戶時代以後「天祖」所象徵的新的天皇制開始成形後，天皇兼具了宗教上、世俗上的權威，而「以德配天」、「易姓革命」的儒教政治文化被加以改造後，便成為近代天皇制的絕對禁忌。然而針對近代日本的「天祖」這個概念，臺灣人不但不能明瞭，也難以在短期間裡消化接受。日本為此帝國曾經試圖將「天命」當做為日本支配或擁有臺灣政權之正統性；換言之，統治者試圖重新回歸本質，以儒教在地化的戰略來去除本身的「他者性」。然而這個政治措施最後卻沒有成功。

雖然如此，日本在統治臺灣期間對於儒教並沒有趕盡殺絕的措施，其甚至在某些地方表現出支持與保護的態度。現今臺北的孔子廟不但是臺灣總督府所重建（1927 年興工）的歷史建築物，每年祭孔大典的主祭官也經常都是臺灣總督擔任。而當臺灣的知識分子為了批判封建陋習表現出詆毀儒教之態度時，這個外來的執政者卻反過來維護儒教，1936 年施梅樵所發行的《孔教報》如果沒有日本政府背後支持是很難成立的。日治時期臺灣人傳統儒性之濃淡，和其抵抗殖民統治意志的高低並沒有直接的關係；在統治者與被統治者都擁有儒教文化的情形下，要探測臺灣人抵抗意志的存在與否，比較適當的方式是檢驗其如何去對應儒教與天皇制統治原理之間的不完全交集。而在這個前提下，我們依然可以觀察到「漢賊倒置」這個結構性現象。殖民統治中所謂的抵抗是相對於統治而存在的，其並非是絕對、先驗的法則，而是相對、經驗式的現象。在日本帝國的文化統合之下、原本漢民族的「漢賊不兩立」之歷史情境之所以會被反轉成「漢賊倒置」，其原因可能是由於，在統治者與被統治者擁有許多共同文化資產的特殊殖民歷史情境下，臺灣人利用傳統文化來凸顯「我性」，抵抗日本帝國「同化」的空間被極端地壓縮。也因此日治時期，我們很難找出類似像印度或愛爾蘭等，為了要抵抗英國的殖民統治，而極端的去動用或強調自己的傳統文化的歷史事例。

總之，個人希望以殖民特異性做為切入點，探討日本的儒教、漢詩文、國語與殖民地文化統合之間的關係。在分析「同文同種」這個文化現象如何造成臺灣政治上「漢賊倒置」的現象之際，筆者期望還能進一步地去分析或說明東亞這個概念的內涵。透過這個糾纏了中國、日本、臺灣三個區域之文化、政治、社會、歷史等複雜要素的交叉點，我們可以有效的去觀察日本或整個東亞文化的本質，更可以理解戰前臺灣的殖民歷史以及戰後臺灣的後殖民情境。



圖片 1：殖民地日語教育倡者伊澤修二及台北芝山巖日語傳習所教師遇難紀念碑。如何重新認識及評價日本殖民地教育的內涵和影響，是台灣近代史研究者的的重要課題。



圖片 2：日治時期台灣公學校國語教科書。日本語「同化」政策與文化統合的矛盾，顯示出不同於歐洲殖民統治的特殊歷史性格。